



热爱书店的理由

韩浩月



①



②

最容易让我觉察到故事感的书店是旧书店。旧书店的经营多是老文化人,书店没有精心的装修与装饰,旧书码放得也较随心所欲,但旧书天然的纸张气息、店内往来的读者以及老板对书店历史与逸事的讲述,很自然地就形成了书店故事的结构与细节。

印象很深的是在合肥拜访过的爱知书店,书店老板上世纪80年代就在北京开书店,后回到老家合肥,一开又是二三十年。那天我浏览完书店里的书后,老板向我讲述早年的书店历史,以及我们都认识或认识的书店从业者。闲聊完毕,我在书店二楼写东西,老板在一楼照顾顾客,当日来者多为老者,足见书店已深度融入社区日常。写作之余,目睹了老板与一位读者在书店门口的道别场景,他们约好下次见面时间,彼此鞠躬,主客间如同多年老友,这一场景令人感动。因此,每次想到合肥,这一幕总会浮现于脑海,于我而言,合肥也因这家书店的存在,额外多了一份吸引力。

我还在武汉拜访过集成古旧书社,开书店的老先生已经80多岁,他守着这家书店已近40年。书店位于武汉大学校园不远处,这些年来,老先生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聊天的时候,说起武大的名人他如数家珍,从前泡在书店的学生,有谁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人;还云淡风轻地聊起,每逢下大雨书店被淹后自己如何拯救旧书。书店面积不大,一排排陈旧的书架上摆满了同样陈旧的书籍,走道上方挂着一把可能悬挂了一二十年的旧吉它。在书店里的片刻时光,内心有诸多安宁。这家旧书店虽然貌不惊人,但我仍将它视为武汉城市魅力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守在市井深巷的角落里,朴素却散发着光芒。

书店可以是一座城市的名片。递出这张名片,就等于递出一座城市的文化样貌与文化底蕴,作为读者也好,游客也好,发现并认识这张名片,是了解一座城市文化内涵的捷径之一。

图题①:济南阡陌书店;图题②:泉州风雅颂书店。

郑国栋有句名言:“哪儿是文化地标,就把书店开到哪儿去。”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济南老商埠、老舍旧居、趵突泉、百花洲、山东博物馆、579百工集等济南文旅重要目的地,偶然抬头就会撞见阡陌书店的招牌。显然,能把书店开到这么多的文化地标里,不仅是书店老板“任性”使然,城市对书店的喜爱与支持,也为书店扩张提供了保障。值得一提的是,阡陌书店与城市文化深度绑定,借助老舍在济南写下名篇《济南的冬天》这一背景,策划出版口袋本同名图书,仅在自有渠道便销售出5000余本,书店运营思路与盈利能力令人刮目相看。

类似上述重视书店地位的城市例子还有许多。当然也有个别“千年文化名城”,找不到一家有特色的书店,这难免让城市魅力逊色不少。能够公开表达对书店的喜爱,对书店个性给出充分尊重,对书店发展给予关心和城市,书香无疑是浓郁的。

长期观察、探访各地的书店,我发现有的书店名声在外,故事四处流传;有的书店低调内敛,需要置身其中才能体会。非常有趣的是,有故事的书店,也许只在店里待上十几分钟,就能感受到书店故事的脉络与气息;而没故事的书店,纵然书架高耸,图书林立,一眼看上去堪称“高大上”,但无论如何都感受不到故事元素的存在,这样的书店,难以吸引固定读者,去过一次足矣。

近年每去一座城市,都会拿出专门的时间逛书店。逛完书店后意犹未尽,会写随笔记录,目前已经积累数十篇文章。有朋友也开始用“书店迷”这样的称谓形容我。作为一名书店观察者,我的确长期关注书店的美态、形态、业态,也着重于去了解书店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联——“书店是城市之光”“书店是城市的灵魂”“书店是城市的审美底色”,这样的比喻是成立的,但不是全面的,人们像热爱书籍那样热爱书店,但城市里确有太多书店像花朵一样枯萎,当然也有很多书店如坚强的沙漠玫瑰,坚持生长与盛放。“如果没有书店,城市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值得反复讨论。

一座城市把书店放在什么位置,意味着这座城市对书店的重视程度,再进一步看,也标志着这座城市的书香浓度。印象很深的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把书店放在了县城新区美丽的湖畔广场中心位置,开阔的空间里,两幢小楼精致又显眼,夜晚室内的灯光与屋顶的星光、湖水倒映的波光融为一体。徜徉在书店内,一时间让人忘记这是一家县城书店,它和很多一线城市中的那些“最美书店”相比毫不逊色。在这里明确能感知到:这家书店肯定倾尽了这里的人们对书店与阅读的热爱。

在其他一些城市,亦不吝将书店置于重要位置的例子。福建省泉州市有一家名为风雅颂的书店,几家分店都开在具有地标价值的地点,其中一家开在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五店市传统文化街区,在这个完整保留明、清、民国三个时期130余栋传统建筑群中,其中有一栋留给了书店——书店的妙处在于,无论置身于何种气场里的建筑群中,总会成为其中的“明珠”。在五店市传统文化街区这个多处景观令人眼前一亮的地方,脚步迈入书店,仍然会由衷地发出赞叹——最美的建筑,就该留给书店。

在山东省青岛市,距离著名景点栈桥不远,有座建于1901年的塔式建筑,最初的用途是邮局,现在是邮政博物馆,良友书坊便开在这幢楼里,并且占据了一楼和顶楼这两个最佳的楼层位置。楼体以红砖砌成,历经125年,虽有岁月痕迹,但远观与近赏,都能发现设计与建造的独到之处。多年前,良友书坊落户于此,便再未迁址。在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里开书店,若非书店人的情怀与坚守,以及地方对书店业的支持与保护,是很难坚持下来的,但由此也给市民与游客提供了一个美好的目的地。书店与城市地标就这样相互交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书店,单是路过或是站在边上看一看,就会给人带来幸福感。

济南阡陌书店近年来活跃于爱书人视野,这家创立不过10余年的书店,已经开了11家分店。书店老板

滴胶保护层,在不同角度的光线反射下,富有层次感。

纪念类徽章特别是校庆纪念徽章,融合建校年份、校园标志性建筑等元素,更喜庆气氛。如天津130周年校庆标识,以“中国红”“天大蓝”为主色,数字“1”以北洋工学院旧址主楼立柱为原型,数字“3”融入卫津路校区主楼的视觉形象,数字“0”以北洋园校区主楼为原型,构思巧妙,寓意深刻。这枚实体徽章也在校庆期间广为发放,其设计效果得到在校师生及校友的认可。

另有1995年百年校庆纪念徽章,以花瓣形状作为外轮廓,打破传统圆形设计范式,赋予徽章灵动、柔和的视觉观感。红、蓝、金三色搭配,分工明确,象征喜庆与荣耀。花瓣形、圆形、盾形三重嵌套,文字、数字信息置于其中。画面中心为卫津路校区主楼及第九教学楼外景。1958年8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天津大学时,曾在第九教学楼前的台阶上向师生群众挥手致意。2015年中国邮政发行天津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邮票,该建筑被选为邮票主图案,下方文字直接点名纪念主题并置于飘带中,增加了庄重感。徽章色彩明丽、图文清晰、材质精良,设计风格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美感。

天津大学还曾推出以复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校徽为主的徽章套装。值得一提的是倒三角形的民国时期校徽,包括“国立北洋大学”“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徽共三枚。“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西迁并与北平大学等校共同组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于1938年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一枚校徽,将这段不平凡的历史铭记。

20世纪50年代的运动类徽章,包括劳卫奖章、奥运会纪念章等,这些徽章重在生动刻画运动员在比赛时的身姿,背面有年份、名次、等级的文字信息。天津大学还有一枚纪念章,画面中心应是一位体态轻盈的花样滑冰运动员,背景有莫斯科大学主楼的剪影图,文字有“莫斯科大学”“天津大学”“象征性体育联欢季”“57.11.7—58.2.7”,这枚纪念章可视为1957年至1958年,天津大学与莫斯科大学开展体育交流活动的凭证。画面信息丰富,题材难得,见证了天津大学国际交流的成果。

图题为1995年发行的天津大学百年校庆纪念章。

徽章上的天津文化(十一)

巍巍学府北洋高

罗丹



2025年10月,天津大学举办了建校130周年校庆活动。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为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初名北洋大学堂,盛宣怀任首任督办,设头等学堂(本科)和二等学堂(预科),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1912年,学校定名为“北洋大学校”,次年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1935年8月,在北洋大学40周年校庆之际,由萧友梅作曲、廖辅叔作词,《北洋大学校歌》正式确立:“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几经变迁,1951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定名为天津大学。

徽章是学校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尤其是对历史悠久的高等院校而言,方寸之间能够展现学校乃至所在城市的精神风貌。天津大学徽章种类丰富,设计精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天大的各类纪念徽章开始更多添加“北洋大学”文字和画面元素,彰显学校的历史传承和深厚底蕴。根据笔者收藏,按照不同用途,天津大学的徽章可分为以下几个品类。

徽章类校徽,即由在校师生佩戴以表明身份的长方形徽章。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不同机构使用的徽章版式基本一致,通常为白底红字,红字为机构名称,无其他修饰,以求清晰,易于辨识。徽章校徽依照时代发展,在制作工艺上有所变化,早期为铜制珐琅彩釉,随后有铝质、合金材质,有些徽章上“天津大学”四字较为紧凑,徽章长度也随之缩小。常见的在校师生版为白底红字,教职工版为红底白字。另有铝制的绿底白字版本,更为少见,背面刻有建校时间。“天津大学”校名系将毛泽东主席手迹集缀而成,其中“天津”二字出自毛主席第一次为《天津日报》题写的报头。学校校徽为圆形,实体校徽亦采用圆形为主要呈现形式。校徽中部为一面盾徽造型,有篆书“北洋”二字,下方有数字“1895”,表示学校的早期校名和建校时间。盾徽外部环绕有“TIANJIN UNIVERSITY (PEIYANG UNIVERSITY)”和“天津大学”字样。校徽边缘为51个齿状修饰。

近年来天津大学发行的实体校徽,以较色“北洋蓝”喷涂,留白部分为金属原色。稍早期的校徽,以金、红二色搭配,齿饰外沿和盾徽轮廓用红色填充,其余部分采用金色明暗交替描摹,结合章面的

活上丛话

记得1972年的腊月二十三,那天风雪交加,我帮家里排个儿买大肉。当日凌晨两点多钟,我起床后顾不上洗漱,穿着厚厚的棉衣裤带上小板凳,顶风冒雪冲进肉铺门前黑压压的长龙里排队。由于寒风凛冽,坐着和站着时间长了手脚都容易冻木,为应对恶劣天气,排队的人不时有跺脚、搓手的,也有做原地小跑运动的。清楚记得,街道代表孙二姑站出来提议,由一个人值守,半小时一轮换,每人把自带的坐具当“替身”排队,可暂时回家暖和一下,得到大家赞成的,小板凳自然加入了“替身”行列。当肉铺开门时,“替身”主人陆续回来,虽然队伍开始缓慢移动了,可大家却没有立刻换掉“替身”,反而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聚在一块滔滔不绝地谈笑,直到“替身”到个儿人才顶上去。此后,只要家里有购买紧俏商品通宵排队的差事,我必带小板凳如法炮制,小板凳成为我的好帮手。

1985年我成家时,把一个小板凳带到自己的小家。这个小板凳的尺寸和结构很适合小儿起坐,从女儿小时候就使用,到如今外孙也时常用。这个杉木材质的小板凳,不仅有实用功能,更融入了我家五辈人的深厚情感。

对天津建筑文化的一次深度巡礼

——评《多维视角下的万国建筑》

刘焱

天津的建筑、街巷的肌理,乃至每一处风貌遗存,不仅是一部立体的城市编年史,更是解读其在中国近代化浪潮中“领风气之先、开时代新局”独特角色的关键密码。近日出版的《多维视角下的万国建筑》一书,其价值远不止于对万国建筑样式的罗列,更是一一场别开生面的、由多位专业作者合力完成的书写。该书从保护、修缮、活化与体验的多重专业视角出发,为读者构建了一条穿透砖瓦砾、直抵城市精神内核的认知路径。

通览全书,最令人称道的是其科学严谨的编撰思路。本书秉持文史资料“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特色,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清晰的认知框架。全书分为五部分:“你的共同记忆”“广博的建筑之美”“焕新的多彩空间”“时尚的城市新貌”“缤纷的特写镜头”,逻辑上实现了由点(单体建筑)、线(特色街道)及面(城市风貌)的层层递进,引导读者系统地、完整地、深度地认识天津建筑文化的深度巡礼。

而本书真正的重量与温度,来自其背后兼具权威性、烟火气的作者阵容——规划者、研究者、记录者、运营者同台对话,确保了内容的立体与鲜活,更加突出了如下特点:

一是规划者的蓝图视野。书中收录了天津城市规划设计领域专业人士撰写的文章,作为在天津老城厢长大的规划师,他的视角兼具情感温度与专业高度。而同样来自规划领域、深度参与海河柳林“设计之都”核心区规划的设计师陈宇,其视角则展现了历史文脉如何与未来城市设计相衔接。

二是研究者的历史深耕。为全书奠定学术基调和历史纵深感,是著名历史文化学者、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罗嵩伟先生。他在序言中总结说,以“万国建筑博览”为代表的建筑文化,集中体现了天津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是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

三是记录者的时空对话。本书还收录了规划师与纪录片导演的对话。其中,对话方之一便是纪录片

导演路树强。作为大型生态人文纪录片《海河》的总导演,他用影像具象化了河流与文明、自然与人文互动的深层关系。他与规划师的碰撞,正是时空记录与未来蓝图之间的一次深度对话。

四是运营者的活化实践。那些让历史建筑真正“活”在当下的关键人物在书中并未缺席。安里甘艺术中心、樾院、张园等成功案例的文旅运营者的文章被收录其中。他们从市场定位、业态策划、活动运营等实际层面,讲述了如何将凝固的历史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承的当代文化空间,为“活化利用”提供了最接地气的注脚。

正是这种多维、权威且务实的作者构成,让本书跳脱出了普通建筑导览的范畴。它使“万国建筑”不再是静止的标本,而是通过规划者、研究者、记录者、运营者的眼睛与双手,被全方位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最为直观且富有趣味的创新点,是封面那张淡雅而精准的手绘地图。在当今数字导航触手可及的时代,编者坚持采用手绘这一传统形式,正是为了传递一种不同的阅读理念:对城市历史建筑的探寻,不应只是坐标的抵达,而应是一场有温度、有发现、有遐思的漫游。这张地图从构思到成稿,编辑团队与设计团队反复推敲,力求在有限的尺幅内,既清晰勾勒出天津近代建筑的地理脉络,又传递出街巷的肌理与历史的层次感。当读者手持这份地图漫步于天津街头时,或许它能成为一把引导观察的钥匙,开启的不仅是对建筑风格的认知,更是对城市空间独特叙事与时间厚度的沉浸体验。

因此,《多维视角下的万国建筑》最终提供的不仅是一册权威的建筑解读文本,更是一座沟通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桥梁。它让我们看到,那些凝固的风景之中,始终跃动着这座城市开风气之先、铸兼容之体的蓬勃之心。这本书是解读天津城市文化的重要读本,其成书本身即是一次“如何阅读一座城”的示范。



祥云(中国画) 李旭飞

在我的大半生中,换了几茬家具,唯独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板凳却始终保留着。

上世纪60年代初,我父母因工作调动从南昌举家北迁天津,爷爷为庆祝我们的乔迁之喜,特地从距南昌180多公里的万载县潭埠乡下老家来送行。记得爷爷从背篓里取出一对小板凳说,咱们老家虽解放较早,但老区还很难,人们都是用自产的东西当礼品互赠。原来,这对小板凳是爷爷为缓解我们姐弟三人途中车马劳,下狠心砍伐了一棵自种10余年的杉树,再请一位做木匠活儿的远房亲戚做的。

后来,在赴津候车时还真用上了它们。那时,全国几大铁路线还没有完全贯通,南昌到天津路程较远,需要几次换乘,而换乘火车晚点是常态,加上候车室老旧,每一个换乘站总是人满为患。记得在上海站候车时,车晚点好几个小时,车站座椅上坐满了乘客,连地面上也挤满了躺躺倒倒休息的乘客,父母照看着我们俩大小行李箱包,我们姐弟三人轮流坐在这对小板凳上休息。这对板凳的由来以及漫长旅途中的切身感受,让我不得不对产生了一种特殊情感,从此,板凳不仅成为我喜爱的坐具,更在日后的天津生活中派上了用场。

我家的小板凳

李楠夫



天津第一热电厂始建于1937年,是天津近代工业的重要代表,2011年11月,在运行了70多年后,该厂全面关停。2012年夏,天津第一热电厂改造项目的紧急冲刺,让我们开启了一次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关系的探索。如今10余载过去,当年图纸上的构想已化作海河之畔的鲜活图景,那些曾反复推敲的规划细节,以温暖的姿态融入市民的日常生话。

2012年的一天,我们迎来第一热电厂改造项目的艰巨挑战。从接到邀请到提交方案,团队仅有11天的时间来准备。这意味着在这11天内,必须要完成资料消化、实地踏勘、方案设计及模型制作等一系列工作,这无疑是一场毫无缓冲的脑力攻坚战。

对海河工业文脉的敏感度成为规划破局的关键。团队立刻进入战时状态:白天分头踏勘,夜晚集中研讨。作为厂区核心的主厂房始建于1937年,是海河沿线较为完整的大型工业遗存,沿用至2011年关停,承载着天津近代工业的厚重记忆;1985年建成的195米高烟囱,虽曾是城市制高点,却已随厂区关停终结使命。如何让老厂房这一核心遗存获得新生,成为规划的核心命题。

方案构思初期,我们反复论证老厂房的价值。泰晤士河畔由发电厂改造的泰特当代美术馆的成功给予启发,让大家坚定了保留主厂房的决

心。二者同为河岸热电厂改造,具备文化、旅游、艺术共生的天然条件。

出于对工业文明的敬畏,我们将老厂房确定为区域核心,并大胆规划:在寸土寸金的河海沿线,预留厂房南侧1公顷作为城市公园,和周围高楼大厦的高密度开发比起来,这1公顷的城市公园就像海河两岸的一个“活眼”,让老厂房的工业风貌更加突出。

最终规划方案定为“一园两组三院”的结构:沿着海河岸边建设屋顶的商业院落,确保街道连续;住宅组团呼前呼后排建筑风格;超高层塔楼通过裙房与老厂房围合办公区,以材质对比实现新旧共生。空间自河岸向塔楼逐层升高,保障景观通透。同时,结合现状架空热力管廊,预留管廊入地路由,将供热泵站设于北侧,这一市政规划如今已成为区域供热的“隐形功臣”。

2012年7月,这一方案凭借对工业遗存的尊

蝶变新生的城市空间(九)

打捞海河岸边的记忆锚点

——原天津第一热电厂更新之路(上)

狄阔 邱雨斯



重、新旧建筑的协调以及合理的技术经济指标获得认可,我们受邀继续深化方案。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图纸上的乌托邦,要落地为现实,必须跨越理想与现实的鸿沟。

高层建筑日照遮挡是核心难题。周边住宅年代不一、资料缺失,我们实地测绘、查阅档案、入户调研,反复优化布局。如今项目落地,周边居民生

活未受影响,反而多了一个休闲去处,当年的精细调整终见成效。

日照问题更特殊的是热力管廊、供热泵站的结合协调,这是热电厂改造独有的挑战。由于厂区需保留部分与供热相关的市政设施,如何平衡设施功能、施工工期与空间效果,成为棘手的难题。经反复沟通、多次调整方案,最终管廊顺利入地,泵站低调运转,既保障了市政功能,又没有因烟囱拆除破坏城市景观的连贯性。

现如今,当年的规划已完全落地。海河之畔这座红砖墙的老厂房不再是“生人勿近”的厂区,而是化作一家集文创、展览、特色商业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成为市民生活中的一座“城市客厅”。虽然标志性烟囱已拆除,但在规划中强化的老厂房工业元素,如斑驳的红砖、厚重的梁柱,仍清晰诉说着这里的过往。远处的玻璃幕墙塔楼与老厂房的坡屋顶在阳光下相映成趣,恰好呼应了当年“新旧共生”的规划初心。

“两个居住组团”早已迎来业主人住,社区配套与商业院落无缝衔接,居民下楼就能吃到特色小吃;在“商业院落”里,既有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店、书店,也有服务周边居民的便民商超,当年规划的“街廓连续性”,如今变成了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更让人欣慰的是,我们当年为海河预留的“内气”,那1公顷的城市公园,已成为海河沿线一处美丽的休闲之地,老人在这里打太极,年轻人在这里拍婚纱照,工业遗存与现代生活在这里完美交融。漫步于此,老厂房红砖温润依旧,这场跨越10余年的老厂房更新实践,留住了往日的工业记忆,打通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狄阔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级工程师;邱雨斯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建筑师)